

1969

佛岡文史

第八輯

(總9輯)

佛岡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 編

一九九一年八月

封面题字：刘恩锦

封面绘图：廖凤仪

责任编辑：阮寿明

佛冈文史 第八辑（总第9辑）

佛冈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佛 冈 县 印 刷 厂 印刷
一 九 九 一 年 八 月 出版

广东省非营业性出版物准印证

91粤印准字第33号

目 录

- 一、郑道庄先生二三事……………谢锡枢（1）
- 二、德范文章照后人
——开明人士邓冠芳先生事略
……………廖柏昭（13）
- 三、兴学育才 造福桑梓
——郑景初先生事略……………郑中品（26）
- 四、抗日将领张光琼捐资、创办
洛洞学校始末……………张伟林（32）
- 五、行医五五载 赤诚为人民
——范馥邦生平事略……………范济民（37）
- 六、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乡抗日
自卫委员会”……………邓渭生（42）
- 七、抗日诗文学偶……………廖 望（48）
- 八、活捉日本指挥官……………邓渭生（54）
- 九、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佛冈青
年运动……………朱继良（57）

ZB17/10

十、注重质量 讲求信誉

——记解放前怪头圩“英宝

隆”饼家……………郑国象（65）

十一、佛冈民间婚姻风俗今昔

……………钟慧星（70）

十二、佛冈烟岭范族源流初考

……………范济民（79）

十三、地方小名胜二则

（一）临禽岩

（二）七娘潭的传说……廖柏昭（85）

来函照登……………（89）

编者话……………（93）

郑道庄先生二三事

谢锡枢 供稿

郑道庄先生（一九〇二——一九五二），佛冈县龙南乡石脚下村人。毕业于中山大学，曾任国民党广东省教育厅股长、中国国民党佛冈县党部书记、佛冈县立第一初级中学（即现佛冈中学）校长等职。

作为中学校长，郑道庄先生非常热心家乡教育事业。他治学严谨，教学认真，对学生平易近人，谆谆善诱，爱护备加。我是郑道庄先生的学生，对其治学态度和从教精神，深感钦佩。现就所知略举二三事以志郑道庄先生之为人。

一、为复办佛冈县立第一初级中学而尽力。

一九四五年暑假期间，正是中国人民历时八载的抗日战争将要夺取最后胜利的关键时

刻，不少人都在开始盘算抗战胜利后的个人出路。当时，兼任佛冈县立第一初级中学校长的梁庭光（佛冈县县长）和教导主任朱寿洪等人亦见异思迁，先后离开佛冈他就。校长、主任的离佛他往，波及县立第一初级中学的整个教师队伍，造成人心浮动，学校能否继续办下去亦成问题。因为当时佛冈第一初级中学的教师绝大部分都是梁、朱从外地聘来的。抗日面临胜利，学校行政竟然离职他就，不得不使他们顿感失落而意马心猿。县立第一初级中学如果流失这批教师，当地定难再觅，到时肯定将会因师资缺乏而面临崩溃。在此关键时刻，郑道庄先生出于维护家乡教育事业之心，临危受命，接任县立第一初级中学校长之职，并从自己家中拿出部分资财来垫支教师薪水，以稳定教师情绪，使县立第一初级中学又得以正常开办下去。

学校刚刚开学，报纸传来了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大喜消息，全国各地呈现一

派狂欢景象，人们都沉浸于庆幸欢乐之中。此刻的郑先生既为中国八年的艰苦抗战最终取得彻底胜利而高兴，同时又为筹划县立第一初级中学的办学校址而忧心。原来，该校原址设在附城，一九三八年农历九月初一日附城突遭日机狂轰滥炸，立时整个附城连同县立第一初级中学几被夷为平地，仅剩一片残垣碎砾，被迫迁往水头莲瑶“崇本祠堂”，在宗族意识下，校名也只得改称“崇本初级中学”。一九四五年春，由于种种原因，学校从莲瑶迁到附城附近的石溪天主教堂（现凤星小学）并恢复“佛冈县立第一初级中学校”校名。但是这天主教堂原是县城附近一带唯一的一间较为正规的完全小学即卫冈中心小学的校址，佛中的搬来，卫冈中心小学只得停办，实为一得一失，长此下去，县城一带学龄儿童必是就学无门，而佛中本身也将断绝县城一带的生源，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佛中搬回附城原址，把天主教堂交

回卫冈中心小学。然而这又谈何容易？！佛中在附城原址早已满目疮痍，房舍荡然无存，在此复办中学非有一笔较大的费用不可，哪来这笔钱？靠省靠县拨款？当时刚值战后，正是百废待兴，无论是县、是省都难以批拨此项用费。面对这个现实，确是苦煞郑先生。经苦思良久，郑先生决定召开全校教师会议，征询大家意见，为建校出谋献策。在教师们的热烈讨论、共同研究下，认为要摆脱困境、打开建校局面，只有向社会各界募捐一途。郑先生考虑到除此确已无良策，便决定采纳教师们意见，实行募捐集资复校，并制订了募捐的具体方案，这就是（1）售卖有奖建校义票，向群众作有奖募捐集资；（2）发动石角、水头地区黄、刘、郑三大姓人用各自的祖尝捐助；（3）鉴于战乱刚过，民生维艰，决不增收学生学费，不向学生家长施加经济压力；（4）发动全校师生上街售卖义票。作出决定后，郑先

生亲自召开各班干部会议进行动员以统一学生干部思想,接着举行校会,郑校长亲自向全体师生作动员,要求大家同心协力,上街义卖,务求学校在旧校址恢复起来。听过动员,全校群情激昂,于是立即赶印有奖募捐义票(义票是蜡纸油印的,每张面额五角,每一百张为一本)。然后发放到学生手中,由学生向其家长或上街、回村向亲朋义卖。同年十一月巧逢吉河大庙庆典(即做“神功”又叫“打醮”)。为义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原来吉河大庙每五年做一次神功,这是佛冈地面最隆重的神诞,到时上至水头下至汤塘一带的群众赴庙朝拜者日夜络绎不绝。为增加热闹气氛,每届“神功”的主持者务必到省城广州聘请粤剧名班在大庙近旁的田野上搭棚连日做大戏(粤剧)。大戏设主台和子台,主台即戏台,子台实际上是为有钱人观戏而设的,是在正对戏台(主台)前方设些座位,买票入座,子台入场券经营权,

用投票方式，由价高者承包。无钱买票的，只能在子台左右和后面站立观看，叫企位。不管子台还是“企位”，特别是“企位”，都日夜爆满，可谓人山人海，熙攘异常，此外还有不少卖茶蛋的、卖熟油豆腐的、各类花生瓜子、水果和其它各式小食品档的，当然更有各款赌档的。总之，这期间，在大庙一带日夜都人潮涌涌、热闹非常，是兜售义票的好去处。郑校长一面和当届大庙神功“总理”联系，要求他接待义务义票员的食宿，一面与子台中标者曾繁桥联系，要求他准许佛一中卖义票同学入内卖义票。另方面，在学校组织一支二十余人的宣传队伍，由体育老师李保立率领到大庙卖义票（我当时亦是其中一员）。同学们日夜活跃在看戏群众和赌钱胜利者的面前。经过师生们的共同努力和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终于筹集到一笔建校资金（详细数不详，总之是可观的一笔），修复了佛一中学生宿舍楼，办公室（即原

魁星阁)和两间教室。一九四六年一月放寒假前,便发动全校学生,将台凳、图书等一切物件搬回附城原校址,当年(即一九四六年)又修建了一间课室和篮、排球场各一个,跟着又修复了一间乒乓球室,一九四七年再重建了一间课室。至此,佛冈第一初级中学便初具规模,不但有三间比较好的、光线充足的课室,并有礼堂、图书室,和一定的体育活动场所。不久郑先生又与县府交涉将县设火药局果园数万平方米场地划归佛一中,使学校面积比原来扩大了二倍多。

二、谆谆善诱,爱生如子。

郑先生对学生从不体罚和大声斥责,学生中出现问题,总是谆谆善诱,苦口婆心。下举一二事以证明之:

一九四六年九月间,一天刚放过晚学,初一班的学生谢某和钟某(同是附城村人),因一张画纸而口角相争,最后激化到大打出手。

郑校长闻知赶到初一课室。那两个同学见校长来到，便马上停手，并迅速把推倒的桌椅重新摆好，自动走到郑校长跟前争相申述理由。郑校长见状强忍怒火，耐心地听完两人的申述，然后严肃地说：“你们都认为自己有理，事实上大家都做错了，打斗就是最大的错”。接着郑校长语气一变，慈祥地说：“你们都是同村人，又一起长大，又是一位中学生，怎么为一张图画纸的小事就大打出手？你们用镜照照，脸上都有伤痕了，明天怎样见同学？好吧，我不责备你们，更不处分你们，回去今晚好好想一想吧！”这时的谢某和钟某眼泪夺眶而出不约而同地哽咽道：“我错了，你处分我吧！”郑校长却微笑着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希望你俩通过这次教训，成为一对好同学”。事后，郑校长似觉对两人仍不放心，远远尾随他们返抵附城才放心。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佛冈二区（现烟岭、

高岗、迳头地区)的长江中学,因学生太少而停办,把初二初三班全体同学转到佛冈中学就读。一次,长江中学转来的部分同学与原佛中旧同学为争蓝球场打篮球而各不相让,从口角相争升级到互拿棍棒准备打斗。此时正值郑校长不在校,主任黄常端火速出面制止,并不分青红皂白给双方每人记过处分。一区(即石角、三八、水头、龙南地区)的同学(也就是原佛中学生)觉得校方处分不公,由卫联学会出面组织罢课,并到石角(县城)游行示威,提出要严惩二区肇事同学,把肇事同学赶出佛中。这一行动,不但是佛中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全县绝无仅有的一次,大大震动了各阶层人士,更使国民党县府寝食难安,不断派人与郑校长联系,要求交出学生名单,当赤色分子处理。郑校长却一口拒绝,说这一事件纯是校方处理不当所致,并无幕后人物指使。由于郑校长态度坚决,当时县长黄祥光也不敢要求国民

党驻军镇压。后来由黄常端主任邀集双方学生代表到校务处听取郑校长的解决办法。郑校长首先承认校方处理不当，宣布处分无效，接着指出学校形势严峻，国民党驻军随时可能到校镇压，继而苦口婆心地教导大家要以团结为重，学业为重。就这样便把一场眼看造成惨案的风波完满平息下来。

三、生活朴素、洁身自爱。

郑道庄先生身为中学校长，在生活上对自己和家人的要求却十分严格。当时，各地方上层人物相互搓搓“麻将”，这是平常事，佛中教师每逢星期六晚和星期天都是以搓“麻将”去消磨时光，但郑先生自一九四五年任佛中校长以来，从未参加过这种活动。他的休息时间都是到石角圩家人所开的“永华”铺中照料业务或带领子侄到菜圃中劳动而渡过。

记得郑先生之妻舅方师舜，见姐夫担任佛中校长，以为到来投靠可获得一席教师之位，

但郑校长见他并无大学毕业文凭，学历较浅，难以胜任教师之职，只委他以抄抄写写和管理学生膳食的工作。后来还因其管理不善，内宿同学对膳食很有意见，郑先生为免于影响学生情绪和学校声誉，而置亲戚情面于不顾，让方师舜返回三水县另谋出路。

郑先生治家严谨，生活朴素。郑先生任佛中校长以来，只居住在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小房。这样的小房，还空出一半作会客之用。房间内只有一副木板床和一张学生上课用的书桌，床上一张草席，一张普通棉胎和一个瓦枕，书桌上摆放着初中各年级的课本和其它书籍；会客室更为简陋，只平放着两三张长木凳。其妻方氏带着两个孩子居住在球场边的一所小屋（这间小屋原是民国二十三年管果人所居，异常低矮简陋）。郑太太随夫在佛中居住，除要照顾好自己亲生的两个孩子外，还要照顾郑先生发妻之女郑大友、侄女郑大珍、和自己的

妹妹方美华三人，但她为人勤劳贤淑，并不因丈夫是中学校长而过寄生生活，而是靠自己双手，以承接车衣来维持合家的日常生活，所吃蔬菜也全是她带领家小所种植。在郑先生和郑太太的影响下，合家人相处得十分融洽，彼此互相尊重，相互关怀。

阿水 整理

德 范 文 章 照 后 人

——开明人士邓冠芳先生事略

廖 栢 昭

邓冠芳先生本名谷穗，别字桂芬，清光绪七年(1881年)七月出生于本县汤塘镇下黎村一个清贫的书香之家，幼而聪明，少而好学，他没进过什么学堂，只凭十载寒窗，在良师的谆谆教导和自己的刻苦钻研下，造就出一手深厚的古汉语功夫。他学问深邃，文采斐然，同时在数十年的积极社会实践中，养成了廉朴、正直、合群、为公等美好品德，树立起勇于接受真理、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宝贵精神。他生前参加过中国同盟会、中国国民党，担任过清远县议会议员，联卫局局长，三十年代以后，集国民党潯江区分部书记、两黎小学校长于一身，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寿终正寝。

邓冠芳在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曾参加过